

學 鑒

第二輯

■ 吳根友 主編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【第二輯】

■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「985工程」项目成果

■ 吴根友 主编



武大
WUHAN
UNIVERSITY
PRESS

版社
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鉴. 第2辑/吴根友主编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08. 4
ISBN 978-7-307-06137-8

I. 学… II. 吴… 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5156 号

责任编辑: 杜七红 责任校对: 刘 欣 版式设计: 詹锦玲

出版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(电子邮件: wdp4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980 1/16 印张: 22.625 字数: 325 千字 插页: 3

版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6137-8/C·200 定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发刊缘起

当代中国，学术之繁荣，大有空前之势；然则是否绝后，吾辈不敢悬揣。学人如云而书刊如林，以概言当代学术之盛况，似乎并无矫诬之嫌。学人既夥，其研究之轨辙则不拘于一途；书刊甚众，其成果之公布亦各得于其所。然轨辙非一，其取径必有末路与康衢之别；文事既繁，其创获亦必有深弘与浅狭之殊。而鱼龙相杂，玉石共生，不惟有司惮于悉察，繁学人又恶乎尽辨！于是出版单位可定学术之高下，刊物级别能判文章之优劣，其于鉴照乏术衡程无式之际，由外以规内，据简以控繁，未尝不可以济一时之穷耳。然舍经从权，行之既久，非惟其本末倒置之弊立显，而学术之种种颓败，又无不乘瑕蹈隙而起！长此以往，其所断送者又非徒学术之一端而已！斯有二三同仁，人称珞珈七子，亟思有以振济靡溺而救人心于万一。然狂澜既倒而清流不足以当其颓波，人心惟危而道德亦无以救其沦丧，此孔子所谓末如之何也！而七子者，于匪夷匪惠之时，何为邪？何不为邪？亦惟趋古人之风，学以为己而已矣，岂有他哉！然独学而无友，孤陋而寡闻，是以《易象》曰“丽泽，兑；君子以朋友讲习”，其言兑以两泽相丽而偶，像君子群居以切磋也。特七子聚而讲读，迨之于今者，钻燧改火，其数有五矣。而学之有所得于心，必有所应之于手者也，是以又不能无文。然海内君子，饱学之士众矣！欲与讲习之而切磋之，何由而能致之乎？庄生云遥而无闷者，其可得邪？此《学鉴》之必不可无也。且《书》有之曰“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”，孔子亦有之曰“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”！施于有政者，其于圣人则可，而区区七子者

又何能间焉！然则《诗》不亦云之乎？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”，又云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则“学鉴”云者，锡其“类”求其“声”而已。倘蒙海内君子有充类之思而继以伐柯之行，则浮尹旁达，又何虑滥风恶俗不能为之一改也！然则《学鉴》之发刊，尤为铭感于心而不可不志之者，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暨郭齐勇教授，既为七子之讲习辟其场所，亦予《学鉴》之创刊斥其资度；而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院士亦时加褒诱，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庆辉博士又慨然承其梓事，其援引后进策励学术之公心，亦可鉴之于居诸也！

程 水 金

公历二〇〇六年一月廿五日

草于珞珈山麓颜乐斋

目 录

经 史 扶 微

春秋战国时期“忠”观念的演进

——以儒家文献为主线,兼论

忠孝、忠信与忠恕观念 丁四新(3)

说“谪”

——兼论汉代政治谴告理论的民间基础 杨 华(139)

诸 子 学 衡

孟子游仕履历考 程水金(161)

简论《齐物论》多元主义的真理观与

包容主义的价值观 吴根友(210)

从“无之以为用”到“无用之用乃为大用”

——试论老、庄哲学的价值发现

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吴根友(230)

典 籍 辨 伪

《经义考》辨伪一例 司马朝军(243)

四库本《野处类稿》真伪考 司马朝军(249)

明代辨伪四大家合论 司马朝军(259)

学 林 旧 事

《湖湘文库·积微居丛书》前言 杨逢彬(305)

人 文 新 论

德育、智育、体育

——现代教育理念的心理意义 师 领 肖格格(327)

禅 意 人 生

我的生活禅之路

——在中国教英语 罗华著 师 领 肖格格译(339)

学 鉴 论 坛

以文会友 温故知新

——学鉴论坛·珞珈七子学术会讲活动侧记 ... 彭公璞(349)

跋 语 吴根友(356)

经史抉微

学
鉴

春秋战国时期“忠”观念的演进

——以儒家文献为主线，兼论忠孝、忠信与忠恕观念

◎ 丁 四 新

“忠”，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在春秋时期，随着天下的分解和社会制度的剧烈变迁，邦国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权力斗争变得日益激烈，在国家内部“邦国”与“君主”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上升，君统与宗统也发生分离，“忠”的观念也随之得以产生与确定。^① 它并与“孝”的观念一起，成为主宰当时社会的两个

^① 童书业云：“在‘原始宗法制’时代，后世之所谓‘忠’（忠君之忠）实包括于‘孝’之内，……臣对君亦称‘孝’，君对臣亦称‘慈’，以在‘原始宗法制’时代，一国以至所谓‘天下’可合成一家，所谓‘圣人能以天下一家’也。故‘忠’可包于‘孝’之内，无需专提‘忠’之道德。然至春秋时，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‘家’，异国、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、同族间之君臣关系，于是所谓‘忠’遂不得不与‘孝’分离。盖首先在异国、异族之君臣关系上产生接近后世所谓‘忠君’之‘忠’。”见童氏著：《春秋左传研究（校订本）》（中华书局2006年版），第244页。从目前的文献来看，“忠”产生于春秋前期，这大概是可靠的。但是童氏所谓“忠”是从“孝”中分裂出来的，并认为在原始宗法制社会前者蕴涵在后者之中的观点，鄙见以为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假定。虽然自春秋以后，“忠”、“孝”之间长期存在实际的影响，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及其反映的社会存在却是明确而不可混淆的。“忠”是与新的社会存在一同出现的，因而它直接反映的是此一新的社会存在所需要的价值观念。应当说，它是自生，而不是派生的。

基本观念。在战国，随着国家利益和君主地位更进一步的强化与抬升，“忠”、“孝”之间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张；在战国末季，“忠”在法家思想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超过了“孝”，并形成了前者支配后者的基本态势。^①确实，先秦诸子对于“忠”及其与“孝”之间的关系的理解非常复杂，充满了众多的论说与辩诘，甚至困惑与矛盾。对于儒家学派而言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因此，对于春秋至战国时期“忠”观念的发展与演进问题，应该得到更为仔细、深入的学术梳理和探讨。

一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“忠”的观念

（一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制作时代与作者

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是两部可以相互参证的有关春秋史事和思想的重要著作。《左传》言史之详，远过其他两部《春秋》传。^②关

① 杨华教授从“宗统”与“君统”相对立的关系角度，对于春秋战国至汉初的“忠”、“孝”关系的演变作了宏观的分析与描述，而将其发展过程概括为三阶段论：春秋之前，“忠”的观念蕴涵在“孝”之中；春秋战国时期，“忠”、“孝”处于冲突之中；秦汉以降，“孝”统于“忠”、“忠”大于“孝”、“孝”服从“忠”。见杨氏著：《春秋战国时期“宗统”与“君统”的斗争——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1997年第5期，第91、97页。杨氏所构造的三阶段论之第一阶段的说法，其实源自童氏。鄙见以为春秋时期（可能包括战国早期）可以单独划为一个阶段。在这一阶段，一般说来“孝”大于“忠”，“忠”受到“孝”的统率，而二者间的冲突并不强烈。

② 《春秋》经，大体是在鲁《春秋》的基础上由孔子编作而成的。《墨子·明鬼下》有周之《春秋》、燕之《春秋》、宋之《春秋》、齐之《春秋》的说法，说明《春秋》不过是当时各国都有的编年体性质的史书。孔子在鲁《春秋》的基础之上作了一些诸如体例的编排、史料的权择和用意的抑扬等工作，这些工作正是“作”之义。但从来源来看，孔子的作《春秋》也属于所谓的编纂。孔子与《春秋》经的关系，孟子已说明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孟子曰：‘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杻杙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即为其证。因此，“作”与“编”之间，在古人那里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，依其着重点不同而言“作”、言“述”、言“著”。

于《左传》的写作年代，曾经引起人们较大的关注。^① 大约下葬于耶稣前3世纪初年的汲冢在晋武帝年间出土了大量战国竹书，^② 其中一篇题名为《师春》。《晋书·束皙传》云《师春》：“书《左传》诸卜筮。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。”按照已经出土的简帛书之篇题抄写位置来看，“师春”大概也书写于末简或末行最末一字之下。当然，这也可能属于所谓物勒工名的现象，即是说，《束皙传》所言的“造书者”仅是《师春》的“抄写者”，而不是该文本的真正作者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正如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后序》所云：“又别有一卷，纯集疏《左氏传》卜筮事，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《左传》同，名曰《师春》。师春，似是抄集者名也。”杜预所云更为具体，第一，明确称“师春”为“抄集者名”；第二，指出《师春》所抄集卜筮事，“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《左传》同”。第一点说明《师春》并非其所抄书的真名。而由于原竹简早已毁亡，到底有多少竹书是由师春抄写的，已经无法搞清楚了。第二点对于弄清楚《左传》的制作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证据。这条证据表明，《左传》的写作年代应该比汲冢墓的下葬年代早一段时间。而郭沫若认为刘歆把《师春》割裂编入《左传》的说法，^③ 的确臆想不实。当今学者，一般都认为《左传》是耶稣前4世纪

① 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是《左传》的作者问题。有关《左传》的相关评论，见朱彝尊：《经义考》（中华书局1998年版）卷169，第875~878页。

② 《晋书·武帝纪》、《晋书·律历志》、荀勖《穆天子传序》、卫恒《四体书势》皆言汲冢为魏襄王墓，王隐《晋书·束皙传》言汲冢为魏安厘王墓，唐修《晋书·束皙传》或言汲冢为魏襄王墓，或言安厘王冢。据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后序》所云，汲冢所出《竹书纪年》的最后纪年时间为“今王二十年”，此“今王”即指“魏襄王”。魏襄王二十年，也就是耶稣前299年。汲冢墓主即在此后不久下葬。有关汲冢墓的下葬年代的争论，参见拙文：《从出土竹书综论〈周易〉诸问题》，载《周易研究》2000年第4期，第15~16页。

③ 郭沫若：《周易之制作时代》，载《郭沫若全集》历史编第一卷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），第388页。李镜池曾驳斥郭氏的看法，见氏著：《论周易的著作年代》，载黄寿祺、张善文编：《周易研究论文集》第一辑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），第501~503页。

的作品,^①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它所记述和反映的对象是直接指向耶稣前 722~468 年之间的史事和观念的,因而我们利用《左传》来研究春秋时期的观念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可靠的。^②

关于《国语》的制作问题,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:“于是谱十二诸侯,自共和迄孔子,表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。”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《国语》,也就是流传到今天的《国语》本子。^③又同书《太史公自序》:“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。”这个失明的“左丘”为谁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加以指明:“《国语》十二篇,左丘明著。”不过,从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《汉书》的说法。傅玄说:“《国语》非丘明所作。”刘炫同之。陆淳说:“《国语》与《左传》文体不伦,定非一人所为。”陈振孙说:“自班固《志》言左邱明所著至今,与《春秋传》并行,号为外传。今考二书,虽相出入,而事辞或多异同,文体亦不类,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。司马子长云:‘左邱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。’又似

① 参见陈荣捷(Wing-Tsit Chan)编译: *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*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3), 第 5 页脚注 8。在西方,高本汉(Karlgren)曾经从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《左传》的写作时间,也认为《左传》是在耶稣前 300 年以前形成的。童书业认为:“《左传》中多预言,其下限约为公元前三三〇年左右”,“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”。见氏著:《春秋左传研究(校订本)》(中华书局 2006 年版),第 261、346 页。

② 在西方,《中国历史手册》一书的作者也说:“它(《左传》)是研究耶稣前 722~468 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的基本资料。”参见 Endymion Wilkinson: *Chinese History: A Manual* (Cambridge,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1998), 第 485~486 页。中国大陆及港台的学者,一般是如此认为的。杨伯峻甚至推测《左传》成书在耶稣前 403~389 年之间。见杨氏著:《春秋左传注(修订本)》之《前言》,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2 版,第 41 页。

③ “语”,原是古代一种着重记言的史书,因其国别不同,则其《语》有异。这些《语》后来被总集在一起,遂称为《国语》。《礼记·玉藻》:“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。”《国语·楚语上》记载申叔时教诲太子之言:“教之令,使访物官。教之语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。教之故志,使之废兴者而戒惧焉。教之训典,使知族类行比义焉。”“语”的目的原本是为了“明德”,但后来它慢慢泛化了。现在所见的《论语》、《家语》、《管子·短语》、竹书《琐语》、《新语》等,都已属于私人著述。

不知所谓。唐啖助亦尝辨之。”叶少蕴（梦得）云：“古有左氏、左丘氏。太史公称：‘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’今《春秋传》作左氏，而《国语》为左丘氏，则不得为一家，文体亦自不同，其非一家书，明甚。”^①对于傅玄、叶梦得等人的意见，其他学者不以为然。如司马光说：“先儒多怪左邱明既传《春秋》，又作《国语》。为之说者，多矣，皆未甚通也。先君以为邱明将传《春秋》，乃先采集列国之史，因别分之，取其精英者为《春秋传》。而先所采集之稿，因为时人所传，命曰《国语》，非邱明之本志也。故其辞繁重，序事过详，不若《春秋传》之简直、精明、浑厚、遒峻也。又多驳杂不粹之文，诚由列国之史学有厚薄，才有浅深，不能醇一故也。不然，邱明作此重复之书何为邪？”陈造的解释是：“左邱明《传》记诸国事既备矣，复为《国语》。二书之事，大同小异者多，或疑之。盖《传》在先秦古书，《六经》之亚也。纪史以释经文，婉而丽。《国语》要是传体，而其文壮，其辞奇。”黄省曾说：“昔左氏罗集国史，实书以传《春秋》，其释丽之余，溢为外传，实多先王之明训。自张仓、贾生、马迁以来，千数百年播诵于艺林不衰，世儒虽以浮夸、阔诞者为病，然而文辞高妙精理，非后之操觚者可及。”^②

今人王树民敷衍从傅玄到叶梦得之说，而云：^③

（1）《国语》的编定者，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说法不同，《史记》说是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”，《汉书》则称“左丘明著”。……可知编定《国语》与写作《左氏春秋》的本来是两个人，司马迁说得很明白，一个是左丘，一个是左丘明；不过他们的事迹为后人所知者极少，其名有相近，因而被

^① 上述诸引文，见朱彝尊编：《经义考》（中华书局1998年版）卷209，第1071页。最后一条，又见卷169，第876页。此版本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《四部备要》缩印，并据扬州马氏刻本校勘。

^② 上引诸文，俱见《经义考》，卷209，第1071页。

^③ 下引文，见王树民：《〈国语〉的作者和编者》，载徐元浩撰（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）：《国语集解》（中华书局2002年版），第603~604页。

混同为一个人了。…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所列举的这几个人大致以时间先后为次序，左丘列于屈原与孙子之间，说明其时代应约略相近，正在战国中期。按《国语》二十一篇，而《晋语》独占九篇，在晋国三卿中，又多记赵氏之事，说明左丘应为赵国人，或与赵国接近之人。

(2)《国语》与《左氏春秋》既同记一个时期之事，内容自多相同或相关者，稍加比较，即可知《国语》多保存原文，故各部分之间颇不一致，而《左氏春秋》则为已经作者润饰修整者，全书如浑然一体。因此，二书的某些材料来源可能为出于一途，然不可谓二书即出于一手。自从《左氏春秋》被说成为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经古文派宗之，《国语》也被称为《春秋外传》。经今文派力攻《左传》，特别强调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”之语，更确指左丘明为《国语》的作者。很明显，这是捕风捉影之谈，硬把左丘与左丘明当作一个人了。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^①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^②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所录《报任安书》云：“盖昔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及如左丘明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论书策以舒其

① 明嘉靖刻本荀悦《前汉纪》武帝天汉二年所录《报任安书》直接将“左丘失明”抄作“左丘明失明”，前一“明”字，疑为衍文。版本见上海涵芬楼影印《四部丛刊》（中华书局1922年影印版）。

② 见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（中华书局1997年版标点缩印本），第3300页。

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”^① 据此，司马迁似乎已经认为《国语》为左丘明所作。不过宋淳熙本胡重刻本《文选》所录《报任少卿书》“及如左丘明无目”作“乃如左丘无目”，^② 然则司马迁是否认为《国语》为左丘明所作，尚在然否之间。不过，《汉书》将《国语》定为左丘明之作，这一点是清楚的，而且自司马迁之后，今古文经学家亦皆认同此一观点。由此而言，司马迁所说《国语》的著者“左丘”为左丘明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至于叶梦得所谓“左”与“左丘”相区别之说，则涉及古人三字省称，即“左丘明”可不可以被省称为“左氏”、“左丘”、“邱明”的问题，这可能还同时涉及“左丘明”的氏到底是“左”或是“左丘”的问题。从左丘明作《春秋传》而可以省称为《春秋左氏传》来说，似乎左丘明之氏为“左”。这在《史记》卷14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得到印证：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不过，《年表》下文接着说战国中后期，铎椒为《铎氏微》，虞卿为《虞氏春秋》，吕不韦为《吕氏春秋》等，似乎这是汉儒以“某氏春秋”的题名方式分别诸书的传统，并非先秦旧称。因此，设若左丘明之氏为“左丘”的话，那么是将其所著《春秋传》命名为《左丘氏春秋》或《左丘春秋》好呢，还是将其称为《左氏春秋》更为适宜呢？抑或是当时人的称谓习惯与后人不同：“左丘明”在特定的表达环境里能不能称之为“左丘”或“左氏”，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人的称谓习惯有关的？不过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，自司马迁之后，汉人都是以“左丘明”、“左氏”、“丘明”来称呼其人的，并认为《国语》的作者为“左丘明”，^③ 然则将司马迁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述出来的“左

① 见班固：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（中华书局1997年版标点缩印本），第2735页。该传《传赞》还说：“孔子因鲁《史记》而作《春秋》，而左丘明论及其本事，以为之传；又纂异同为《国语》。”

② 见萧统编：《文选》（中华书局1977年版）卷41，第581页。

③ 参见《经义考》卷169，第875页。除《汉书·艺文志》外，王充说：“《国语》，《左氏》之外传也。左氏传经，辞语尚略，故复选录《国语》之辞以实。然则左氏《国语》，世儒之实书也。”见《论衡·案书》篇。

丘”看作是对“左丘明”的一种称谓方式，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简要说来，“左丘明”一般可称作“左氏”或“丘明”，在特殊语言环境里也可能称作“左丘”；司马迁所言作《国语》的“左丘”仍可能指为《春秋》作传的“左丘明”。

确定汉人普遍认为《国语》为左丘明所作是一回事，考察《国语》或《左氏春秋》是否实际上为左丘明所作则是另外一回事。^① 上述王文第2条引文从《国语》、《春秋左传》文本处理方式或文本体现出来的特征不同，以作为证明二书并非同一著者，甚至作为“左氏”与“左丘”相分别的证据，^② 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。因为根据这些差别而判断其历史的真实性，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。王充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实际上都已经大体指出王文之所云，然他们对之欣赏、赞叹，但没有由此否定《国语》由左丘明所作的观点。不过从现代著作人的概念来看，《左氏春秋》确曾因为经过大量的修整、润饰而似乎变得浑然一体，从而凸显了“著者”或“编著者”的身份；而《国语》的文本来源则显得颇为原始，“著者”或“编著者”的身份从而隐没不彰。但是，由此我们就可以断定二书一定不是出自同一位人物的或“作”或“编”的成书活动吗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《国语》符合被给定的《左传》标准，才会承认它们出自一手的可能性？

进一步，这里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，《汉书》所谓《国语》为“左丘明著”之“著”，与今天严格版权观念下的此一概念其含义并不相同。《说文》有“箸”而无“著”字。《汉书·张汤传》：“受而著谏法廷尉挈令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著，谓明书之也。”《汉书·

① 汉儒相传《左传》为左丘明所作，然迟至战国中期最终定型。后人对于《左传》的作者有许多猜测，然而终究缺乏实据。

② 这一点，童书业云：“至于《国语》，则吾人认为与《左传》毫无关系，盖本先秦、秦汉间旧史籍之残余，刘向父子合而成此书，故不完不备，所载文字亦显非一时一人之手笔，与左氏书首尾一贯而完整者绝异。《国语》中每多与《左传》相同之记载，且或有违异，《左传》作者何故为此不完不备、杂乱无章之书，反乱己书之体例邪？必不然矣！”见氏著：《春秋左传研究（校订本）》，第262页。